

营建“金学”巴比塔

——域外《金瓶梅》研究的学术理路与发展走向

葛永海

《金瓶梅》研究是国际汉学关注的热点领域之一。早在 18 世纪,《金瓶梅》即在域外广泛传播。经过几个世纪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域外《金瓶梅》研究大致可分草创、发展、繁荣、持续四个时期,在文献、文本和文化三大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已形成自身的学术理路与研究特色,同时,由于文化隔阂与交流阻碍也造成一些疏漏与缺失。本文对域外《金瓶梅》研究史加以系统检视,论其成败得失,同时展望其发展走向。

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金瓶梅》显然是一部可以与《红楼梦》相颉颃的文学巨著,与“红学”相呼应,《金瓶梅》的研究也被称为“金学”。随着海内外“金学”的蓬勃发展,其思想、艺术等诸方面的价值愈来愈得到全面的认识和公正的评价。美国学者海托华在《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中认为:“中国的《金瓶梅》与《红楼梦》二书,描写范围之广、情节之复杂、人物刻画之细致入微,均可与西方最伟大的小说相媲美。”另一位美国学者罗夫也指出:“《金瓶梅》和左拉及易卜生的作品同样地是艺术巨匠手中的艺术品。”

早在 18 世纪,域外即有学者译介《金瓶梅》,在几个世纪的传播与研究中,《金瓶梅》逐渐成为世界共同的珍贵文学遗产。时至今日,《金瓶梅》已拥有英、法、德、意、拉丁、瑞典、芬兰、俄、匈牙利、捷、南斯拉夫、日、朝、越、蒙等多种语言译本,并在域外拥有一批执著而成就突出的研究者。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已连续举办了五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汇集了诸多海外学人进行金学研讨,有力推动了域外“金学”的发展。本文旨在对域外“金学”进行学术史的检视与探讨,分析其成就与缺失,并展望其发展走向。

转引自王丽娜《金瓶梅 在国外》,《金瓶梅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4 版,第 358 页。

转引自小野忍《金瓶梅 解说》,黄霖、王国安编《日本研究 金瓶梅 论文集》,齐鲁书社 1989 年版,第 13 页。

这五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分别是第一届 1989 年 6 月在江苏徐州,第二届 1992 年 6 月在山东枣庄,第三届 1997 年 7 月在山西大同,第四届 2000 年 10 月在山东五莲,第五届 2005 年 9 月在河南开封。

一、域外金学发展历程

纵观域外对《金瓶梅》的译介和研究,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阶段为草创期:18 世纪至 19 世纪。

《金瓶梅》的外文译介始于 18 世纪。早在日本江户末期,著名通俗作家曲亭马琴(1767—1848)就根据日本读者的需要将《金瓶梅》加以改编,书名《新编金瓶梅》。而西方将《金瓶梅》片段文字译出的最早译者是法国著名汉学家巴赞(A. P. L. Bazin),巴赞的法文译本题作《武松与金莲的故事》(Histoire de Wou-Song et de Kin-Lien),收入 1853 年法国巴黎出版的《现代中国》(Chine moderne)一书,内容为《金瓶梅》的第一回。其后,1879 年乔治·加布伦茨译《金瓶梅片断》(George Gabelentz: Revue Orientale et Américaine, 1879),载法国巴黎出版的《东方和美洲杂志》10—12 月号。译文所据为满文本《金瓶梅》。

第二阶段为发展期:1900 至 1949 年。

总的来说,这一阶段以翻译为主。《金瓶梅》的外文翻译,继 18—19 世纪之后,从片段译文、节译和改写状态逐步向全译本发展,主要有日本和欧美两条线索:

这一阶段,日本又陆续推出多种《金瓶梅》译本。井上红梅翻译的日文节译本《金瓶梅》,1923 年由上海日本堂书店出版。1948—1949 年东京东西出版社出版了尾坂德司以第一奇书本为底本的《全译金瓶梅》。几乎同时,东京东方书局出版了小野忍与千田九(丸)一据《金瓶梅词话》合译的全译本《金瓶梅》,尾坂德司的译本遂被弃而不用。这个译本一版再版,至 1973—1974 年已出六版,堪称当时最好的日译本。

欧洲以法国为最早。法国汉学家乔治·苏利埃·德·莫朗(George Soulie de Morant)的《金莲》(Lotus dor, roman adapté du chinois)是继巴赞的片段译文后的法文节译本,由法国巴黎庞蒂埃与法斯凯尔出版社于 1912 年出版。全书一册,294 页,所据为张竹坡第一奇书本。1932 年李辰冬曾在《大公报》发表《金瓶梅 法文译本》予以评论。

德国学者弗朗茨·库恩的德文译本《金瓶梅:西门与其六妻妾奇情史》(Kin Ping Meh; Cder, die abenteuerliche Geschichte Von H si Men and Seinen Sechs Frauen)据张竹坡第一奇书本翻译,于 1930 年由莱比锡岛社(Leipzig inselverlag)出版,全书一册,分四十九章,共 920 页。1930 年 6 月 1 日国内刊物《文艺新闻》曾刊有肖燕所撰的《金瓶梅 在德国》的书讯广告,对《金瓶梅》的德文译本、译者、出版社及其他有关情况作了简单介绍。库恩译本还有 1954 年版、1955 年版、1961 年版、1970 年版。1954 年以下各版皆由德国威斯巴登岛社出版。

英国首先出现的是节译本。早在 20 世纪初,就有英文译本问世。刊登于 1930 年 3 月 10 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 113 期的佚名文章《金瓶梅 英译志》,是国内介绍《金瓶梅》在英国出版情况的较早文字。英国伯纳德·米奥尔据库恩德文本转译的《金瓶梅:西门庆与其六妻妾奇情史》英文版,分别于 1939 年和 1940 年由伦敦约翰·莱恩出版社与纽约 G. P. 普特南父子公司出版,卷首有阿瑟·戴维·韦利的序文。同时英国的全译本也问世了。其著名者有英国克莱门特·埃杰顿《金莲》,据第一奇书本翻译,因为译文是与著名作家老舍合作,文笔较为流畅,1939 年由伦敦 G. 劳特莱基出版社出版,1954 年纽约格罗夫出版社修订再版。

这一阶段的域外《金瓶梅》研究总体还处于肇始阶段,研究成果颇为少见。日本的研究虽然走在前列,也仅写有个别辞典条目,如宫琦的《金瓶梅》等;还有一些文学史章节,如盐谷温的《金瓶梅》等。这种情况随着日译本的繁荣发生大的改观,1948—1949 年日本学者较为集中地

参见黄霖主编《金瓶梅大辞典》,巴蜀书社 1991 年版,第 1117 页。

宫琦撰写的条目《金瓶梅》,《日本百科大辞典》,东京三省堂书店 1910 年版;盐谷温介绍《金瓶梅》的文字载《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东京大日本雄辩会刊 1919 年版。可参见吴敢《二十世纪 金瓶梅 研究史长编》,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3 版,第 1 页。

推出二十余篇论文,以及一本类似论文集的《金瓶梅·附录》,在日本形成《金瓶梅》研究的一股热潮。

第三阶段为繁荣期:1950—1978年。

这是国外“金学”研究的一个繁荣期,亚洲与欧美的研究者成绩显著,亚洲以日本为代表,欧美则以美国为盛。

日本的《金瓶梅》研究,在这一阶段与中国的《金瓶梅》研究基本已是并驾齐驱,主要集中在文献研究方面:首先是作者研究,老一辈《金瓶梅》研究者鸟居久靖,其《金瓶梅 作者试探》列举了小说七个方面的差错矛盾,认为很难判断《金瓶梅》是某个个人根据创作意识有计划地执笔,从而支持潘开沛“集体成书”说;其次是版本研究,本阶段经过一批日本学人的努力,取得全方位的进展。鸟居久靖《金瓶梅》版本研究较为深入,指出约有抄本、词话本、绣像本、第一奇书本、异本五类版本。对于词话本,继长泽规矩也、小野忍之后,鸟居久靖、上村幸次、饭田吉郎、太田辰夫等用力最勤,1963年4—8月大安株式会社以慈眼堂本、栖息堂本“两部补配完整”影印出版《新刻金瓶梅词话》,可以说是对此项研究的一个小结。

还有对《金瓶梅》与《水浒传》关系的探讨。主要有小野忍《金瓶梅 的文学》、大内田三郎《水浒传 与 金瓶梅》、上野惠司《从 水浒传 到 金瓶梅》等论文。

此外,关于《金瓶梅》研究的历史总结与资料汇编也出现了。泽田瑞穗除了著有《关于 金瓶梅词话 所引的宝卷》、《金瓶梅 书目稿》等之外,更重要的著述是《金瓶梅研究资料要览》,此文经过增修,于1981年由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会出版,成为《金瓶梅》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汇编。该文与饭田吉郎的《金瓶梅 研究小史》皆为域外金学史的重要著述。继1948年至1949年日本《金瓶梅·附录》之后,本时期又推出两部论文选集。1963年5月《大安》第9卷第5号是《金瓶梅特集》专号,收有十篇论文,1965年则出版了《金瓶梅论文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涌现出如清水茂、后藤基已、寺村政男、中野美代子、池本义男等新一批《金瓶梅》研究者。

韩国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韩国正音出版社1956年出版朝鲜文的《金瓶梅》,金龙济译,全100回,5卷,附有插图。此本据张竹坡评本第一奇书译出,回目按张评本简化回目译。随着《金瓶梅》在韩国的出版,相关研究始逐步展开。

再来看欧美。欧美的金学研究以美国韩南、夏志清、戴维特·罗依,英国阿瑟·戴维·韦利,前苏联马努辛、勃·里弗京(即李福清)等为代表。

1956年,美国阿普尔顿—世纪出版社出版《中国文学宝库》一书,其中载有美国 Chaichu 与 Winbery Chai 英文翻译的《金瓶梅》第1回,这是美国出版的较有影响的译本。美国研究者中以韩南成果最著,他于1962年在《亚洲杂志》发表《金瓶梅 的版本及其他》,对《金瓶梅》版本做了极为细致的研究。次年,又发表《金瓶梅 探源》,该文以冯沅君等中国学者的研究为基础,对《金瓶梅》所引用之小说、话本、戏曲、史书等作了系统的溯源,是一部有关《金瓶梅》来源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韩南上述二文,资料丰赡,论证审慎,向为研究界所重。美国学者夏志清对《金瓶梅》的探讨也值得注意,夏志清著《中国古典小说评介》全面论述了《金瓶梅》的作者、成书、思想和艺术,尤其对全书的结构做出精到分析,认为只有中间70回具有现实主义的完整性,

《金瓶梅·附录》由东京东方书局1948—1949年出版,4册,收入论文14篇,参见泽田瑞穗《增修 金瓶梅 研究资料要览》,黄霖、王国安编《日本研究 金瓶梅 论文集》,第319页。

原载日本《中文研究》1964年1月第4号,收入黄霖、王国安编《日本研究 金瓶梅 论文集》。引文见第177页。以上小野忍论文原载《中国的八大小说》,日本东京平凡社1965年版;大内田三郎论文原载日本《天理大学学报》1973年第85辑;上野惠司论文原载日本《关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纪要》1970年第3号,俱收入黄霖、王国安编《日本研究 金瓶梅 论文集》。

以上泽田瑞穗主要论文与饭田吉郎的《金瓶梅 研究小史》,皆收入黄霖、王国安编《日本研究 金瓶梅 论文集》。

他称之为“小说中的‘小说’”。

此外,戴维特·罗依《张竹坡对 金瓶梅 的评论》,认为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论在中国古代小说传统评点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强调艺术结构的整体评论,而不是微言大义的阐发”,因而“是很光辉的文学批评”。

英国阿瑟·戴维·韦利是著名的汉学家,他在为伯纳德·米奥尔英文节译本撰写的“引言”里,较为全面地讨论了《金瓶梅》的文学价值、创作情况、时代背景、作者、版本等,论及作者“卢柟说”,而主张作者“徐渭说”。

德国《金瓶梅》研究在这个时期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祁拔兄弟积毕生之功完成的《金瓶梅》德译本,于 1967 年由瑞士天平出版社推出第一卷,出版工作此后持续了十五年,才最终使这部六卷本《金瓶梅》完全面世。这一译本得到了德国汉学家的高度评价。

此阶段值得注意的另一个现象是,部分欧美学者将《金瓶梅》研究设为博士论文选题,如詹姆斯·沃恩的《金瓶梅 的版本与校勘》(1964 年,纽黑文耶鲁大学);弗劳克·法斯滕瑙的《金瓶梅 的人物形象与 玉环记 :中国小说理论试析》(1971 年,慕尼黑路德维格—马克西迷连大学);保罗·马丁森的《报应和赎罪:从 金瓶梅 观察中国宗教和社会》(1973 年,芝加哥大学),等等,皆是如此。

正是在这一阶段,前苏联也成为域外金学研究的重要一翼。马努辛一生致力于《金瓶梅》的俄译本工作,并著有《16 世纪社会暴露小说 金瓶梅 :从传统到创新》、《关于长篇小说 金瓶梅 的作者》等多篇论文,代表了本时期前苏联“金学”研究的主要成果。马努辛对金学的最大贡献是用毕生精力和心血译成俄文版《金瓶梅》,该书据《金瓶梅词话》节译,虽然篇幅只有原作的五分之二强,但删选比较得当。该书由马努辛主译,但他未及完成就英年早逝,舍契夫、雅罗斯拉夫、李福清等继续努力,完成全稿,在 1977 年由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1986 年二版,共印行十余万套。该译本质量较高,是《金瓶梅》西文译本最好的几种之一。李福清撰写了译本的长篇序言《兰陵笑笑生及其小说 金瓶梅 》,他着重阐明了各类象征和隐喻的含义,并简明分析了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等人物形象。

第四阶段为持续期:1979 年至今。

本阶段虽无前一阶段的高涨热情,但域外学者保持着持续的关心,与国内“金学”界联系紧密,互为呼应。日本的“金学”研究似有退潮之迹,但实力依然不弱,先后涌现了荒木猛、日下翠、大冢秀高、寺村政男、阿部泰记、铃木阳一等“金学”研究名家。其中大冢秀高、荒木猛成果最著。

大冢秀高关于《金瓶梅》构思既受《水浒传》影响,又受《封神演义》、《三国演义》影响的推断(《金瓶梅 的构思——金瓶梅 与 封神演义 三国志演义 的关系》),关于《金瓶梅》的情节流程“起以玉皇庙,终以永福寺”的分析(《续金瓶梅的构造》)等,已经引起国际“金学”界的注意。荒木猛也颇为活跃,其版本研究功力深厚,如推断崇祯本大约刊行于崇祯十三年之后;通过小说中的干支记日推算《金瓶梅》成书于嘉靖四十年到隆庆六年之间等,都表明他研读渐趋深入。

在此阶段,值得注意的是韩国“金学”研究的崛起,虽然总体成就还无法与日本相比。本阶段 1990 年内外出版社出版了改编本《说金瓶梅》,1991—1993 年汉城青年社出版朴秀镇的《完译金瓶梅》。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陆续有李相如、康泰权、金兑坤、崔溶澈、金宰民等学者,尝

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评介》(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于 1968 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2001 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胡益民等合译的中译本,书名为《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引文见第 190 页。

戴维特·罗依:《张竹坡对 金瓶梅 的评论》,蔡国梁编《金瓶梅评注》,广西漓江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4、47 页。

李士勋:《关于 金瓶梅 德文本译本——译者祁拔兄弟及其它》,载《徐州师院学报》1992 年第 1 期。

大冢秀高:《金瓶梅 的构思——金瓶梅 与 封神演义 三国志演义 的关系》,载《明清小说研究》1996 年第 4 期。

大冢秀高:《续金瓶梅 的构造》,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999 年版,第 137 册。

试着对《金瓶梅》开展研究。

欧美的金学研究以美国为主,法国次之。美国除前面提到的韩南、夏志清外,芮效卫、柯丽德、浦安迪、马泰来、郑培凯等都是美国汉学界的佼佼者。尤为引人瞩目的是,1983年5月,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召开了《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了夏志清、芮效卫、史梅蕊、杨沂、孙述宇、郑培凯、马泰来、雷威安、艾金布勒、陈庆浩、李治华等学者提交的论文十一篇,这是本时期域外《金瓶梅》研究主要成果的一次检阅。其中杨沂、史梅蕊等都是美国“金学”的新生力量。

此阶段域外《金瓶梅》研究除了在深度上掘进外,在传播的广度上也有所加强。来自台北的学者陈益源在第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上介绍《金瓶梅》在越南的有关情况。陈益源在越南所见的《金瓶梅》越南文译本,是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9年3月据昭阳出版社1969年译本的再版。全书一套八册,凡100回,近2000页,而1969年首度在西贡出版的《金瓶梅》越译本,译者及其译述过程还待考。1989年河内再版的本子前有河内师范大学黎德念教授撰述的前言,以十二页的篇幅,对《金瓶梅》做了较全面的介绍,并对《金瓶梅》的多个话题发表看法。该书的“出版说明”倾向于李开先为《金瓶梅》作者的说法。总的看来,越南汉学界对《金瓶梅》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二、学术理路与主要成就

《金瓶梅》在18世纪流播域外,赢得关注以来,研究也一直不绝如缕。尤其进入20世纪以后,有更多的国外学者参与到《金瓶梅》的研究热潮中,成为《金瓶梅》研究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各个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下面我们从文献、文本、文化三大方面对域外“金学”成果予以检视。在文献方面,以来源研究、版本研究为最大突破,在文本方面以叙事研究为最大亮点,在文化方面则以性爱文化研究最引人瞩目。

(一) 文献研究

国外学者的“金学”文献研究以来源研究的成果最具开拓性和创新性,版本研究次之。美国韩南的《金瓶梅探源》发表于1963年,无疑是《金瓶梅》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式撰述之一,它以中国学者的研究为基础,融入自己的许多重要发现,在当时取得集大成的突出成果。

如《金瓶梅》对于《水浒传》的承袭。韩南在《金瓶梅探源》一文中认为:《金瓶梅》所用的《水浒传》版本现已失落,同它最接近的现存版本是清代翻刻的万历十七年(1589)天都外臣序一百回本。韩南的理由是《金瓶梅》中的《水浒传》引文和不止一种《水浒传》版本相似。对于《金瓶梅》和宋元话本小说的关系,韩南在前人研究的扎实基础上,认为《金瓶梅》可能借用白话短篇小说至少在八种以上。韩文对《刎颈鸳鸯会》、《志诚张主管》等八种小说一一分析论述,并阐明对《金瓶梅》的影响,此研究因枝振叶,沿波讨源,论证甚是充分。

韩南《金瓶梅探源》中的“清曲”研究建基于现代学者吴晗、涩斋、赵景深、冯沅君等的《金瓶梅》词曲研究而加以辨析补充,几臻于完备的境地。韩南在文章注释里注明了他对于冯沅君等所编曲目的纠误和补漏。尤其是对李开先《宝剑记》的重要关注,《宝剑记》的一些片段实际上已和小说的一些叙述内容融合为一体。但在韩南之前,尚无人提起《金瓶梅》对它的采用。韩南认为《金瓶梅》中有四处采用此剧的五个片段,并对这四处抄引情况进行了颇为精炼的分析。

韩南对于《金瓶梅》中素材来源的研究详备而深入,并引领了后来者的学术路向,可以说,后来关于此领域的许多研究都是在韩南已有框架上展开,从而逐步将此研究推向深入。如1978

此次会议论文均收入徐朔方编《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关注古代通俗小说研究的文献、文本、文化即“三文主义”是浙江师范大学梅新林教授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这是对古代小说各层面研究的总结和提炼,具有很强的概括力。

本书所据为徐朔方编《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另可参见包振南译稿,见包振南等《金瓶梅及其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年美国学者柯丽德的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戏曲在金瓶梅中的作用》(The Role Of Drama in the Chin Ping Mei), 美国陆大伟的《金瓶梅与公案文学》和毕晓普(J. L. Bishop)的《金瓶梅中的白话短篇小说》等皆是如此。

再来看版本研究。早在 50、60 年代, 美国学者韩南、日本学者鸟居久靖、小野忍等对《金瓶梅》版本情况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韩南的《金瓶梅的版本》是其本源研究外的又一代表性成果, 其中的材料和论断向为国内学者所重视。韩南所见版本较全, 介绍也比较系统。他将《金瓶梅》版本分为三类: A 版、B 版、C 版, 分别指词话本、崇祯本、张竹坡评本, 在详细说明了 A 版、B 版的馆藏情况后, 对这两类版本做了详细比较。此外, 他还讨论了沈德符所说的五回补刻文字, A、B 版前面几回的窜改与亡失章节原委, 以及董其昌、刘承禧手稿去向等情况。

小野忍与鸟居久靖《金瓶梅》版本研究的影响也较大, 为中外学者所关注。小野忍从追踪《金瓶梅》的第一个版本《金瓶梅词话》开始, 简单介绍了词话本、崇祯本、张评本的六种本子, 并对“词话本”与“新刻本”的区别作了阐述。虽然未能超越韩南, 但在日本影响很大。鸟居久靖的《金瓶梅的版本考》因为梳理较为系统, 也值得注意。此外, 在第四届国际《金瓶梅》研讨会上, 来自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陈庆浩研究员, 介绍了《金瓶梅》现存四种“词话本”的存藏及流传情况, 并进行比勘。这也是对版本研究的一次重要推进。

文献研究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作者研究。域外学者的作者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形成了对国内作者研究热潮的呼应。在《金瓶梅作者考证》一文, 日下翠也提出“《金瓶梅》是嘉靖文人李开先的个人创作”的观点。她在该文除重复徐朔方等用过的资料外, 对李开先与《金瓶梅》关系作出一些补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芮效卫提出作者“汤显祖说”。1983 年在美国印第安那那大学主办的国际《金瓶梅》讨论会上, 芮效卫提交了论文《汤显祖创作金瓶梅考》, 他主要以汤显祖和《金瓶梅》抄本最早拥有者的密切关系, 及汤显祖的《南柯记》结尾分明受《金瓶梅》结尾影响等材料为例证, 来试图确认汤显祖的作者身份, 此说虽然引起一定反响, 但尚无积极支持者。

(二) 文本研究

域外金学关于文本方面的研究特色突出地表现在叙事分析上, 其中以美国浦安迪的研究最具代表性。

浦安迪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运用叙事学原理对《金瓶梅》的结构进行分析。首先, 浦安迪认为《金瓶梅》100 回的长度之被分成 10 卷, 每卷 10 回, 乃是隐含着特殊的意义。浦安迪的结论是: “小说叙述的连续统一性也常被划分成很有节奏的 10 回一单元——特别重要的或是具有预示意义的故事情节总是安插在每‘10 回’的第 9、第 10 回之间。”其次, 浦氏对小说结构另一重要观点是, 在作品主体部分之前附加一个结构独立的序曲, 《金瓶梅》袭用了《水浒传》中的一段情节, 对此, “我们不妨将此理解为作家一种自觉的文学创作手法, 用它与小说结局形成结构上的平衡, 同时又建立起一种叙述模式, 提醒读者注意作品主体部分中将要深刻一些的问题”。此外, 浦安迪还论述了小说中对于空间与时间的构思在结构上的意义。

对于具体叙事手法, 浦安迪的见解也颇为独到。他在《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 还重点讨论“反讽”的手法。“反讽”一词, “意指各种可能存在的口是心非现象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学引喻、

陆大伟:《金瓶梅与公案文学》, 中国金瓶梅学会编《金瓶梅研究》第三辑,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

毕晓普:《金瓶梅中的白话短篇小说》, 载《哈佛远东语言文学学报》1954 年版, 第 394—402 页; 又见于台湾《中外文学》1976 年卷 4 第 10 期, 苏友贞译, 第 174—185 页。

日下翠:《金瓶梅作者考证》, 载日本《东方》杂志 1984 年第 1 期; 又见于《明清小说论丛》1985 年第 3 辑,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此论文收入徐朔方编《金瓶梅西方论文集》。

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53—54 页。

典故、对话语句,甚至描述情景等文字表里之间的每一点脱节和差异”。浦安迪“逐一列举了作者用来给故事添上一层反讽意味的一系列具体技巧”,并加以认真分析。此外,美国学者陆大伟主要剖析小说中的“借用”手法,认为《金瓶梅词话》中非写实性的说唱文学引用可分为两类:一是与内容有关系的寓意性引用,二是实验性的、形式上的引用。陆大伟的主要结论是:作者是为了扩充和丰富小说的表达能力而采取这些引用说唱文学的非写实的手法,作者通过这些非写实手法故意制造疏离效果,目的是让读者注意作者透过小说所传达的意义。在大陆研究者还习惯于用传统的情节结构观点分析作品时,这些从西方叙事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就具有了较为明显的理论引导和实践示范意义。

除了叙事研究,域外“金学”文本研究的其他方面显得并不突出,基本上属于中国大陆潮流的跟随者,但在一些具体观点上也有所突破,如主题思想方面,耶鲁大学的郑培凯在《酒色财气与金瓶梅词话的开头》中肯定《金瓶梅》讨论酒色财气是为了“戒讽劝喻”,但反对魏子云的“政治讽喻”说,斥之为“索隐派”的复活。美国的凯瑟琳·卡尔丽茨的《金瓶梅的修辞》则以“以家喻国的隐射”来分析《金瓶梅》的思想主题。此外,人物形象研究如日本荒木猛《金瓶梅词话人物登场表》、前苏联马努辛《金瓶梅中表现人的手法》、美国杨沂《宋惠莲及其在金瓶梅中的象征作用之研究》,等等,都有一定的特色。

(三) 文化研究

在文化研究方面,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性爱文化方面,民俗文化次之。学者以欧美与日本为主。性爱文化研究方面,荷兰学者高罗佩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中把色情小说与淫秽小说加以区别,认为《金瓶梅》不专以淫猥取乐,而是“用一种平心静气的语气”来描写世情,是明代色情小说的代表,与专以淫猥取乐的淫秽小说不同,其价值比后者要高。日本学者在这一方面成果亦多,分别从儒家性观念、道家性观念以及比较文学等角度予以探讨,如奥野信太郎的《好色文学谈义》、长泽规矩也的《金瓶梅和明末淫荡生活》、小野忍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与金瓶梅》、《金瓶梅的色情描写》、荒正人的《色情和文学》、武田泰淳的《肉体的问题》及后藤基巳的《金瓶梅的时代背景》等,都比较集中地讨论了《金瓶梅》的性爱文化内涵。

民俗文化方面有美国郑培凯的《金瓶梅词话与明人饮酒风尚》,梳理分析《金瓶梅词话》中明白指出酒品种的场合共五十三处,作为具体例证,以明书中描写各种不同酒类的特性以及不同人物的饮酒习惯,从而对《金瓶梅词话》所反映的明人饮酒风俗做了小结。此外,日本小川阳一的《金瓶梅中的酒令》和池本义男的《金瓶梅与中国茶文化——致张远芬先生、胡文彬先生》等也分别结合明代的时代风习,讨论了小说中的酒文化与茶文化。在2005年开封举行的第五届《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藤原美树等人曾以《金瓶梅》和《清宫珍宝百美图》为资料,对西门庆宅邸大厅和其妻妾居室内的家具进行考察,认为家具与主人公的社会身份以及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其观点也值得注意。总体而言,域外的文化研究在系统性和专门性上还不够突出,未能与国内研究分庭抗礼。

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第87页。

陆大伟:《中国传统小说中说唱文学的非写实性引用——金瓶梅词话的模型及其影响》,中国金瓶梅学会编《金瓶梅研究》第四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郑培凯:《酒色财气与金瓶梅词话的开头》,载《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4辑。

杨沂:《宋惠莲及其在金瓶梅中的象征作用之研究》,徐朔方编《金瓶梅西方论文集》。

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1—382页。

胡文彬:《金瓶梅书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0—242页。

郑培凯:《金瓶梅词话与明人饮酒风尚》,徐朔方编《金瓶梅西方论文集》。

池本义男:《金瓶梅与中国茶文化——致张远芬先生、胡文彬先生》,董玉舫译,张远芬校,载《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三、论衡得失与擘画前景

由以上的检视可知,域外学者经过长期的学术实践,已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概而论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资料收集的丰赡与详尽,这突出地表现在文献的发掘与研究方面。美国韩南的《金瓶梅探源》发表于1963年,它以冯沅君《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和其他学者的研究为基础,却取得集大成的突出成果,一个重要原因即如徐朔方在《金瓶梅西方论文集·前言》中所说:“它所收罗的材料极为详备,只有集海内外著名图书馆的收藏才能做到。”再如日本的版本研究之所以取得较大成果,这与日本的文献收藏关系密切。1941年经丰田穰《某山法库观书录》披露了日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所藏的明万历丁巳刻本《金瓶梅词话》,加上此前1932年在中国山西介休发现的《金瓶梅词话》,连同此后1962年上村幸次发现日本德山毛利家栖息堂藏明万历丁巳刻本《金瓶梅词话》,是迄今为止存世的《金瓶梅》版本中词话本系统的所有三个完整传本。这些资料的发掘对于日本的“金学”文献研究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其次,学术态度的严谨与客观。必须承认,许多域外学者在进行《金瓶梅》研究,要多一分严谨与认真,而少了一些浮躁与武断,尽可能避免重复研究与凌虚断语。这一方面表现在开始论题之前大都注重学术史的梳理和总结,以前人研究为基石,争取有所突破。美国学者柯丽德在韩南《金瓶梅》来源研究的基础上,深入爬梳考证,终于在有不少新发现的情况下,于1978年完成《戏曲在金瓶梅中的作用》,这就把域外《金瓶梅》来源研究持续向前推进了。另一方面则是下结论大都较为谨慎,如日本学者大内田三郎在《水浒传与金瓶梅》文中将《金瓶梅词话》与《水浒传》诸版本进行复校,认为《金瓶梅》大部分与“天都外臣本”的字句一致。因为“天都外臣本”刊行于万历十七年,祖本是嘉靖年间版的“郭勋本”。他的结论是:《金瓶梅》的作者即抄写“天都外臣本”或其祖本“郭勋本”中内容,但也不排除《金瓶梅》所作的是一种近于全文的抄袭,而所抄袭的是为我们所未见的版本。在结论中这种较为周全的考虑显示了作者谨慎的学术态度。徐朔方对韩南曾作高度评价:“作者甄别资料的审慎客观的态度足以和最好的学者媲美。”而“审慎客观”大抵是许多西方学者较为突出的治学态度。

再次,理论视野的开阔与独到。中西融通之后往往能够产生许多具有启发性的观点,这主要表现在域外学者的文本分析和文化研究方面。浦安迪对《金瓶梅》中的“反讽”手法剖析深入,他认为:《金瓶梅》“行文中明显出现重复现象远非作者所掌握的素材有限或想象力贫乏所致,而是反映一种深思熟虑的构思,试图通过互相映照的手法烘托出种种意蕴,最后形成一种深刻的反讽层面。”这是从文本叙事出发对小说的思想内涵进行的有益探索。美国的凯瑟琳·卡尔丽茨则在《金瓶梅的修辞》一书的第二章分析了“《金瓶梅》以家喻国的隐射”。凯瑟琳认为,作者把焦点集中在西门府,通过它对上层官僚机构的模拟并转而使其奴仆堕落,以此来暗示当朝政府的腐朽,从而呼唤儒家批评传统的复归。这种对《金瓶梅》政治文化的解读同样富有新意。

这些西方学者都不约而同地运用叙事学或文化学理论,致力于小说的文本分析,细致入微,考探和揣摩小说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心态,这种理论眼光既使《金瓶梅》叙事研究得以深入,发明了国内学者被传统研究方法、角度所遮蔽的研究盲点,并有力地启发了国内学界的理论自觉。

当然,由于文化差异、隔阂等原因,域外学者在取得不少成就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

本书所据为徐朔方编《金瓶梅西方论文集》,另可参见包振南译稿,见包振南等编《金瓶梅及其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徐朔方编《金瓶梅西方论文集》,“前言”第2页,“前言”第2页。

大内田三郎:《水浒传与金瓶梅》,黄霖、王国安编《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

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第68页。

误读与缺失。主要有几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由于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理解偏差，尤其是在翻译方面问题较多，一些译本多有错讹，还有不少不恰当的改动和漏译。法国汉学家乔治·苏利埃·德·莫朗的《金莲》是1912年出版的法文节译本，所据为张竹坡第一奇书本。1932年李辰冬在《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25期的《金瓶梅 法文译本》中曾予以评论。李辰冬评论指出：“《金瓶梅》的文字多系明时方言，即令我国学者尚有不晓之处，忠实翻译定有难事。此书系百数十回的大作，而译者只以二百余页了之，其潦草从事，不问可知。况其好多成语都译错了。”李辰冬还具体举出莫朗译错之词，如“奴家”被译为“家庭的奴隶”，“燕窝”被译为“燕的窝口”等。再如俄译本虽然总体质量较高。但也有研究者在介绍分析前苏联《金瓶梅》研究整体水平后指出：俄文译本的《金瓶梅》还是存在不少缺点，较为明显的如序言过长，不够深入，个别地方叫人看后不知所云。不少章节删削过多，有些内容译得不够贴切，等等。此外，库恩的德译本也有任意增删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由文化隔阂造成的一些误读。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金瓶梅》作者“徐渭说”。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乃晚明进步文学运动的前驱者之一。此说首倡者为英国学者阿瑟·戴维·韦利，他在《金瓶梅 西门庆与其六妻妾奇情史》一书的“引言”里提出：“关于《金瓶梅》作者的候选人，我个人认为徐渭是最有可能的。把徐渭剧本里抒情诗与分散在《金瓶梅》全书中的诗词来作比较，那肯定是有意义的。”而这位英国汉学家的推测后来被证明是建立在一个大误解之上。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卷二五“附录”《金瓶梅》条提及麻城刘延伯藏有《金瓶梅》全书抄本，是从其妻家徐文贞处录得，而徐渭的字为文长，因而被韦利疑为徐文贞的排行兄弟，以致于认定徐渭为作者。其实徐文贞乃徐阶，与徐渭无涉，纯属误会。与此相类的另一例似乎更能说明文化背景差异是导致认识偏差的重要因素，美国学者戴维特·罗依在《张竹坡对 金瓶梅 的评论》中推测《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是清初著名文人张潮的侄子，他的主要依据是张竹坡在评点张潮的《幽梦影》时曾称其为“吾叔”、“叔台”之类，这在我们看来其实更像是对于前辈学者的一种礼貌称呼，但在西方学者那里就把其作为事实看待了。

另外，就法文译本而言，李辰冬曾评论指出：“译者(按指莫朗)在他的序文上说：‘《金瓶梅》与《一千零一夜》同趣’。不知据何而言？固然《一千零一夜》的原文写性交处最多(普通各种译本将此类文字删去——原文注)，然除此一点外，性质、描写、趣味全不相同。”这也说明了国内外学者在文化观念上的歧异。再如美国学者杨沂撰有《宋惠莲及其在 金瓶梅 中的象征作用之研究》一文，以阐释学理论探讨宋惠莲在小说中的象征意义及结构上的作用，较有特色。但是文中却将一再与人私通，最后羞愧自缢的宋惠莲比作爱神埃洛斯之化身，这就不是国内学者所能理解的一种诠释了。

此外，由于文化交流上的阻隔，也造成学术信息未能及时交流而造成疏漏。韩南在其《金瓶梅》来源研究中曾指出：是日本学者小野忍发现并探讨了《金瓶梅》与话本《刎颈鸳鸯会》和《志诚张主管》的关系，从而推动了来源研究的发展。其实事实并非如此，翻检国内民国时期资料可知，《志诚张主管》之于《金瓶梅》的意义早在19世纪30年代即已为许固生所考探，许固生甚至对《金瓶梅》与《志诚张主管》做了极为细致地对读。而小野忍发表《金瓶梅 解说》讨论《金瓶梅》素材来源是在1959年6月，乃在二十年之后。信息上的阻隔导致对《金瓶梅》和

周钧韬编《金瓶梅资料续编(1919—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4页，第64页。

杨士毅：《金瓶梅 研究在苏联》，王利器主编《国际金瓶梅研究集刊》第一集，成都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页。

阿瑟·戴维·韦利：《金瓶梅 引言》，顾希春译，载《河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戴维特·罗依：《张竹坡对 金瓶梅 的评论》，蔡国梁编《金瓶梅评注》，广西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许固生：《金瓶梅 本事考略》，原载《北平晨报》1935年1月18日，收入周钧韬编《金瓶梅资料续编(1919—1949)》，第155—156页。

话本小说的关系考论极详的韩南也未能避免疏漏。这个小事例也说明中外学术信息的交流是何等的重要与必要。

21 世纪以来, 尽管中国大陆的《金瓶梅》研究似乎热潮退去, 但是, 域外学者对于《金瓶梅》研究的热情并未因此冷却。展望世纪前景, 域外“金学”的发展走向依稀可辨。

(一) 传播与研究的覆盖面将进一步扩大。随着当前中国国力的日益增强, 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学习中国文化已逐渐成为一种潮流, 不仅在欧美等发达国家, 在亚非等发展中国家也呈现出热捧汉文化的局面。随着中国文学作品向更多国家传播, 《金瓶梅》的译介也将再次成为更多域外汉学研究者关注的话题,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德国、越南等出现的《金瓶梅》重译、重印现象, 似乎正传递着某种信号。

(二) 域外《金瓶梅》研究的学术梯队已基本形成。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 在欧亚各国, 在老一辈汉学家的熏陶下, 一批对中国古典文学表现出浓厚兴趣的青年学者开始涌现, 比较典型的如亚洲的韩国已有不少硕士、博士投身《金瓶梅》研究, 如康泰权著《金瓶梅的研究》(延世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92 年), 金兑坤著《金瓶梅 明清两代评论研究》(韩国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93 年), 李无尽著《金瓶梅 的两面性考察》(高丽大学硕士论文, 1997 年), 权希正著《金瓶梅》的性文化研究》(东国大学硕士论文, 1999 年)等。在日本则有以《金瓶梅》研究获得博士学位的川岛优子, 著有《金瓶梅 的构思: 从 水浒传 到 金瓶梅 》等论文, 她有望成为日下翠以后第二位日本《金瓶梅》研究的女性学者代表。此外, 20 世纪 90 年代留学于德国的李士勋曾撰文指出, 当时就已有德国青年学生在汉学教授的指导下, 开始对《金瓶梅》的译介情况进行专门研究。这些年轻学者都将是未来域外“金学”研究的希望所在。

(三) 就研究路向而言, 笔者认为, 新世纪域外《金瓶梅》研究的重点论题将在以下两个方面展开。首先是属于《金瓶梅》文献研究领域的社会史料研究, 由于长期以来缺乏内证材料而无法落实作者姓名, 而版本、素材来源等方面的研究又由于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而较难深入。在这种情况下, 探求小说中丰富的社会史料之价值, 进而指出小说描写与历史事实存在哪些差距, 将是很长一段时期内的研究课题, 也是全面挖掘《金瓶梅》价值的基础性工作。

其次是基于文本的文化研究。从文本出发, 运用西方理论观点来探求小说的文本价值与文化内涵, 这是上世纪部分域外学者取得重要成就的学术理路之一。这种“他者”的眼光和视角, 因为植根于西方重思辨的文化土壤, 往往能够带来新的视野, 产生出富有启发性的成果。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 由于绝大多数研究者更热衷于文献研究, 特别是作者的考证, 使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薄弱, 学者投入精力较少, 专门著述不多, 也表明这个领域的研究, 尚有较大的空间可以拓展和提升。可以预料, 回归文本, 加强文化研究, 必将成为域外《金瓶梅》研究的一大发展趋势。我们期待超越民族与语言的“金学”巴比塔在 21 世纪变得更加雄奇壮美!

(作者单位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元亮

参见黄霖、大家秀高、铃木阳一《中国与日本 金瓶梅 研究三人谈》, 载《文艺研究》2006 年第 6 期。
李士勋:《关于 金瓶梅 德文本译本——译者祁拔兄弟及其它》。